

古代铜鼓历史资料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

93

1980.3. 南宁

新平船

PDG

编辑说明

古代铜鼓流传很广，我国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等少数民族地区都有发现，同我国邻近的东南亚各国也有发现。它是我国南方和西南地区古代少数民族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物，是祖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人民同东南亚各国人民之间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关于少数民族铸造和使用的记载，自汉以来，史不绝书。虽然在古代史料中，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往往只是把铜鼓当作怪异来记录，有不少穿凿附会的说法，但其中纪实性的材料，对于研究古代铜鼓，仍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建国以来，我国学者研究古代铜鼓盛情空前，并已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为了推进这一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我们将历代史籍中有关铜鼓的记录材料作了摘要并略加编辑，提供学者们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

一、这份资料分三个部分汇编：第一部分历代记述，收入历代正史和个人著述中的有关资料，这部分按时代顺序编排；第二部分各地记述，收入各地方志和有关著述中的有关资料，这部分按地区编排；第三部分附录，主要收入部分有关铜鼓的文艺作品，这部分按代编排。

二、为了查阅方便，所有资料都加了标点，并于每条之后注明出处，部分内容基本相同的，也注明同见某书。

三、这份资料只是一个初稿，收入资料只是主要的一部分，难免挂一漏万；同时其中还有不少雷同者，未作删削，甚至一些以讹传讹者，也未作考辨。凡此种种，望识者指正。

26.3293
218
2

目 录

编辑说明

第一部分 历代记述..... (1)

一、汉..... (1)

二、魏晋南北朝..... (1)

三、隋唐五代..... (1)

四、宋..... (2)

五、明..... (5)

六、清..... (7)

七、民国..... (18)

第二部分 各地记述..... (20)

一、广西..... (20)

二、广东..... (36)

三、云南..... (39)

四、贵州..... (44)

五、四川..... (45)

第三部分 附录..... (46)

第一部分

历代记述

一、汉

(马)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注：式，法也)还，上之。
(《后汉书》卷廿四)

二、魏晋南北朝

孝武太元三年，诏曰：“钱，国之重宝，小人贪利，销坏无已，监司当以为意！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闻官私贾人，皆于此下贪比轮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
货与夷人，铸败作鼓。其重为禁制，得者科罪。”(《晋书》卷二十六第十六“食货志”)

但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馀，初成，悬于庭，克晨置酒，招致同类，来者盈门，豪富子女，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叩竟，留遗主人也。

(斐渊《广州记》，转引自郑师许《铜鼓考略》)

建武二十四年，南郡男子献铜鼓，有铭。

(虞喜《志林》，转引自郑师许《铜鼓考略》)

欧阳颡字靖世，长沙临湘人也。……年三十，其兄逼令从宦。梁左卫将军兰钦少与颡善，故颡常随钦征讨。钦南征夷獠，禽陈文彻，所获不可胜计，献大铜鼓，累代所无。……时颡合门显贵，威振南土。又多致铜鼓、生口，献奉珍异，前后委积，颇有助军国。(《南史》卷六十六列传第五十六“欧阳颡传”)

《林邑记》曰：“浦通铜鼓，外越安定、黄冈、心口”。盖藉度铜鼓，即骆越也。(案“骆越”近刻讹作“越骆”)有铜鼓，因得其名。马援取其鼓以铸铜马。

(驩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六温水条)

三、隋唐五代

革之属五：一曰建鼓，夏后氏加四足，谓之足鼓；殷人柱贯之，谓之楹鼓；周人悬之，谓之悬鼓；近代相承，植而贯之，谓之建鼓。盖殷所作也。又栖翔鹭于其上，不知何代所加。或曰鹄也，聚其声扬而远闻。或曰，鹭，鼓精也。越王勾践击大鼓于雷门以厌吴。晋时

移于建康，有双鹭啖鼓而飞入云。或曰，皆非也。《诗》曰：“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颂声之辍，铎鼓以鹭，存其风流。未知孰是。灵鼓、灵鼗、并八面。雷鼓、雷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鼓以桴击，鼗贯其中而手摇之。又有节鼓，不知谁所造也。

（《隋书》卷十五、志第十，音乐志下）

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来者有豪富子女，则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竞，乃留遗主人，名为铜鼓钗。俗好相杀，多构讎怨，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本之旧事，尉佗于汉，自称蛮夷大酋，长老夫臣，故俚人犹呼其所尊为倒老也，言讹，故又称都老云。

（《隋书》卷三十一，志第二十六，地理志下）

东谢蛮，其地在黔州之西数百里，南接守宫僚，西连夷子，北至蛮土。宜五谷，不以牛耕，但为畲亩，每岁易。俗无文字，刻木为契，散在山洞间。依树为层，巢而居，汲流以饮。皆自营生业，无赋税之事。谒见贵人，皆执鞭而拜。有功劳者，以牛、马、铜鼓赏之。有犯罪者，小事杖罚之，大事杀之。盗物倍还其赃。婚姻之礼，以牛酒为聘。女归夫家，皆母自送之；女夫惭逃避，经旬方出。宴聚则击铜鼓，吹大角，歌舞以为乐。（《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第一百四十七；《唐书·南蛮列传》东谢蛮记载同）

铜鼓，铸铜为之，虚其一面，覆而击其上。南夷、扶南、天竺类皆如此。岭南豪家则有之，大者广丈余。

（杜佑《通典》卷144，乐四）

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鼓面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偏有虫鱼花草之状。（按此十字，原本脱去，今据《太平御览》补入。）通体均匀，厚二分外。炉铸之妙，实为奇巧。击之响亮，不下鸣鼗。（按此二句，原本脱去，今据《太平御览》补入。）贞元中，骠国进乐有玉螺铜鼓。（原注：玉螺盖螺之白者，非琢石所为。）即知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咸通末，幽州张直方贬龚州刺史，到任后，修葺州城，因掘土得一铜鼓，载以归京。到襄汉，以为无用之物，遂舍于延庆禅院，用代木鱼，悬于斋室，今见存焉。僖宗朝，郑镇番禺日，有林藹者，为高州太守。有乡墅小儿，因牧牛，闻田中有蛤鸣，（原注：蛤即虾蟆）牧童遂捕之，蛤跃入一穴，遂掘之，深大，即蛮酋冢也，蛤乃无踪。穴中得一铜鼓，其色翠绿，土蚀数处损阙。其上隐起，多铸蛙尾之状，疑其鸣蛤，即鼓精也。遂状其缘由，纳于广帅，悬于武库，今尚存焉。

（刘恂《岭表录异》卷上第五页）

四、宋

熙宁元年至元丰元年，横州共获铜鼓一十……十一月，宾州获古铜鼓一。

（《宋史·五行志》）

雍焉元年，黔南言溪峒夷僚疾病，击铜鼓、沙锣以祀神鬼，诏释其铜禁。

（《宋史·蛮夷列传一》）

淳化元年，洪卒，其弟洪皓袭称刺史，遣其子淮通来贡银碗二十，铜鼓三面，铜印

一钮，旗一帖，绣真珠罗襦一。

（《宋史·蛮夷列传二》）

抚水州在宜州南。……诸蛮族类不一，……其族铸铜为大鼓，初成，悬庭中，置酒以召同类，争以金银为大钹。叩鼓，去则以钹遗主人。相攻击，鸣鼓以集众，号有鼓者为“都老”，众推服之。

（《宋史·蛮夷列传三》）

西南诸夷，汉牂牁郡地……病疾无医药，但击铜鼓、铜沙锣以祀神。风俗与东谢蛮同。

（《宋史·蛮夷列传四》）

风土记曰：越俗饮宴，即鼓拌以为乐。……乐器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园、都县、铜拔具等九种为一部，二十二人，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文曲。

（李昉：《太平御览》卷567乐部五“四夷乐”条）

又曰铜鼓，铸铜为之，虚其一面，覆而击其上，南蛮天竺，类皆如此，岭南豪家则有之，大者广尺余。

（李昉《太平御览》卷582乐部二十）

裴渊《广州记》曰：俚僚贵铜鼓，惟高大为贵，面阔丈余，方以为奇。初成，悬于庭，克晨置酒，招致同类，来者盈门，其中豪富子女，以金银为叉，执以叩鼓，竟，留遗主人，名为铜鼓钹。风俗好杀，多构讎怨，欲相攻击，鸣此鼓集众，到者如云。有鼓者，极为豪强。

（李昉：《太平御览》卷785“俚人”条）

乌浒人便以人为淆俎，又取其髑髅破之以饮酒也。其伺候行人小有失，辈出射之，若人无救者，便止以火，燔燎食之。若人有伴相救，不容得食，力不能（尽相）檐去者，便断取手足掌为珍异，以饴长老。出得人，归家合聚，邻里悬死人中当，四面向坐，击铜鼓歌舞饮酒，稍就割食之。奉月方田尤好出索人，贪得之以祭田神也。

李昉：《太平御览》卷786“乌浒”条）

东谢蛮……俗无文字，刻木为契，散在山洞间，依树为层巢而居，皆自营生业，无赋税之事，谒见贵人皆执鞭而拜，有功劳者，以牛马铜鼓尝之……宴聚则击铜鼓、吹大角、歌舞以为乐。

（《李昉：太平御览》卷788东谢条）

通典云：五岭之南，人杂夷僚，不知教义，以富为雄，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又多构讎怨，欲相攻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本之旧事，慰佗于汉，自称蛮夷大长老，故俚人呼其所尊为倒老，语讹，故又称都老也。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七风俗）

铜陵县本汉临允县地，属合浦郡，宋立龙谭县，隋改为铜陵。以界内有铜山。铜山，昔越王赵佗，于此山铸铜。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58铜陵县条）

十道志云：夷多夏少，鼻饮跣足，好吹葫芦笙，击铜鼓，习射弓弩，无蚕桑，缉蕉葛以

为布……。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67容州风俗条）

大铜鼓 铜鼓，铸铜为之，作异兽以为饰，惟以高大为贵，面阔丈余，出于南蛮天竺之国也。昔马援南征交趾，得骆越铜鼓，铸为马式，此其迹也。今密阁所藏颇多，特其大小异制耳。

中铜鼓 铜鼓之小者，或大首纤腹，或容体广面，虽以铜为体，要须待革成声也。

小铜鼓 唐乐图所传天竺部用之。盖以革冒其一面，形如腰鼓，面广二尺，面与身连，偏有虫鱼草木之状，击之响亮，不下鸣。唐贞元中，骠国进乐，亦有是鼓。咸通末，龚州刺史张直方，因葺城池，掘得一铜鼓，舍于延庆寺，以代木鱼。僖宗朝，林嵩守高州。乡墅牧童闻田间蛤鸣，欲进捕之，一蛤跃入穴中，掘而取之，得一铜鼓，其上隐起，多铸蛙龟之状，岂鸣蛤乃铜鼓之精邪！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34乐考七）

陈叔夏得铜鼓，甚大，其饰为蚩尤、飞廉，涂善金而光耀至今不灭。其铭曰：“龙升元年七月大匠涣。”按龙升为大夏年纪，而鼓全似西南夷所作。今密阁犹有，但其形制小劣，无涂金为饰，又其文为戏龟水草，与此异也。崔鸿《十六国书》：“赫连勃勃以铜为大鼓，及飞廉、翁仲、铜驼、龙虎，以黄金饰之，列于宫殿之前。”疑即此也。

（董《广川书跋》卷六）

铜鼓：古蛮人所用，南边土中时有掘得者，相传为马伏波所遗。其制如坐墩而空其下，满鼓皆细花纹，极工致。四角有小蟾蜍。两人舁行，以手拊之，声全似鞞鼓。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铜鼓”条）

广西土中铜鼓，耕者屡得之，其制正圆，而平其面，曲其腰状若烘篮，又类宣座，面有五蟾，分据其上，蟾皆累蹲，一大一小相负也。周围款识，其圆纹为古钱，其方纹如织罽，或为人形，或如琰璧，或尖如浮图，如玉林，或斜如豕牙，如鹿耳，各以其环成章，合其众纹，大类细画圆阵之形，工巧微密，可以玩好。铜鼓大者阔七尺，小者三尺，所在神祠佛寺皆有之，州县用以为更点。交趾尝私买以归，复埋于山，未知其何义也。按《广州记》云：俚獠铸铜为鼓，唯以高大为贵，面阔丈余，不知所铸果在何时。按马援征交趾，得骆越铜鼓，铸为马。或谓铜鼓铸在西京以前。此虽非三代彝器，谓铸当三代时可也。亦有极小铜鼓，方二尺许者，极可爱玩，类为士夫搜求无遗矣。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七）

史称骆越多铜银。《交州记》曰：越人铸铜为舶。《广州记》曰：俚獠铸铜鼓，闻交趾及占城等国，王所居以铜为瓦，信知南方多铜矣。今邕州有铜固无几，而右江溪峒之外，有一蛮峒，铜所自出也。掘地数尺即有矿，故蛮人多用铜器。尝有献说于朝，欲与博易，事下本路诸司谓且生边衅，奏罢之。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七）

予初见梁“欧阳传”称：在岭南多致铜鼓，献奉珍异。又云：铜鼓累代所无，及予在宣抚司，见西南夷所谓铜鼓者，皆精，铜极薄而坚，文镂亦颇精，叩之，冬冬如鼓，不作铜声。秘阁下古器库，亦有二枚。此鼓南无至今用之于战阵，祭享。初非古物，实不足辱秘府

之藏。然自梁时已珍贵之如此，不知何理也。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

铜鼓，南海东西庙皆有之，东庙者径五尺五寸，高有其半。俗谓“洪圣王旧物”。蔡如松作怀古诗，尝辨之云：铜鼓之说，出于《隋书南夷传》：夷人酋长，好铸铜鼓，有事击鼓，夷人尽集，女子首饰，尽戴银钗，取钗击鼓。蔡之说止于此。殊不知虞喜《志林》已载：建武二十四年，南郡男子献铜鼓，有铭。又《后汉书》：马援好骑射，善别名马，征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以进。则知铜鼓在后汉光武时，已为希得，所以有南郡之献，非止见于隋时也。今庙中之鼓，自唐以来有之，《番禺县志》已载其制度，凡春秋享祀，必杂众乐击之以侑神。又府之武库亦有其二，其一，盖唐僖宗朝，郑续（緄）镇番禺，日，高州太宗林嵩所献，初因乡小儿，见鸣蛙之怪，遂得于蛮酋大冢中，事见《岭表录异》，在唐时既能为怪，则至今不知其几百年物矣。鼓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制作精巧，所谓铭志，绝无有也。因周遭多铸虾蟆，两两相对，不知其何意。

石鼓嵯峨尚有文，旧题铜鼓更无人，

宝钗寂寞蛮花老，空和楚歌迎送神。

（方信孺《南海百咏》铜鼓篇）

铜鼓：蛮地多古铜。有铜柱，马希范所立。麻阳有铜鼓，盖江水中掘得，如大钟长筒三十六乳，重百餘斤，今入天庆观。并有铜像二，相传唐明皇像，馀散他处。鼓尤多，其文环以甲士，中空无底，名铜鼓。

（朱辅《溪蛮丛笑》铜鼓条）

点蜡慢：溪洞爱铜鼓，甚于金玉，模取鼓文，以蜡刻板印布，入靛缸渍染，名点蜡慢。

（朱辅《溪蛮丛笑》点蜡条）

五、明

隆庆改元，……四川巡抚曾省吾，议征都掌蛮，令显移镇其地。……都掌蛮者，居叙州——戎县、介高、珙筠、连长、宁江、安纳溪六县间，古泸贼也。……至是其酋阿大、阿二、方三等，据九丝山，剽远近。……省吾议讨之，属显军事……阿大自守鸡冠。显令人诱以官，而分五哨，尽壁九丝城下，乘无备，夜半，腰绁上，斩关入。迟明，诸将毕至，阿二、方三走保牡猪寨。郭成破鸡冠，获阿大。诸军攻牡猪，禽方三。阿二走，追获于贵州大盘山，克寨六十余，获贼魁三十六，俘斩四千六百，拓地四百余里。得诸葛铜鼓九十三，铜铁锅各一。阿大泣曰：“鼓声宏者为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击鼓山颠，群蛮毕集，今已矣！”锅状如鼎，大可函牛，刻画有文彩。相传诸葛亮以鼓镇蛮，鼓失，则蛮运终矣。（《明史·刘显传》）

《通典》：欲相攻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家有鼓者，号为都老。

（《大明一统志》卷80“铸铜为鼓”条）

铜鼓山在融县西二十里，旧传诸葛亮散埋铜鼓以魔蛮僚，后有得于是山者，故名。又武宣县西一十里亦有铜鼓山，下有铜鼓滩，或谓马援铸铜鼓于此，或谓滩声如鼓。

（《大明一统志》卷83柳州府“山川”条）

铜鼓山在郁林州南七十里，相传昔有铜鼓现于此山。

（《大明一统志》卷84梧州府“山川”条）

铜鼓潭在北流县北二十里，昔有铜鼓浮水而出，击之声骇村落，至暮沉水中。本朝景泰三年，其鼓复出，舟人获送本县楼。

（《大明一统志》卷84梧州府）

铜鼓，郡志：左右溪峒时得之，相传为汉马援所制，形如坐墩而空其下，满腹皆细花纹，拊之声如鞀鼓。

（《大明一统志》卷85南宁府古迹条）

宪宗成化四年一月

提督四川军务兵部尚书程信上山都掌蛮之捷，获铜鼓数十，斩五十级，擒二千人。

已未，四川叙南卫指挥同知李矿破山都掌凌霄城。城险峻不可登，贼梯其前，巢焉。南则深数十里无人迹。矿率三千人，从其南循崖而北，梯雪再宿至后山，贼不觉也。攻斩三百六十级，矿手斩五级，堕崖死无算。当道削其二级，独不进秩。大军先后斩千馀级，俘贼属四百。获铜鼓十七，牛马器械亡算，焚二百余砦。

（谈迁《国榷》卷35）

神宗万历二年二月

四川进都掌蛮铜鼓九十三，有声者六十有四；铜铁锅各一，锅两耳如山，制类鼎，可函牛，蛮甚宝之。鼓以声为上，易千牛，次易七八百牛，皆刻鹭雕螭，奇文异状，相传诸葛物。藏鼓二三，即雄长诸蛮。始出劫，必击鼓高山，诸蛮闻声並四集，则椎牛享蛮，出劫数胜，皆鼓之灵也。鼓去则蛮运终。（谈迁：《国榷》卷六十九神宗万历二年第四二四三页）

苗人，……岁时，召亲戚挝铜鼓，斗牛于野，其负者，祭而食之，大脔若掌。以牛角授子孙，曰：“某祖、某父，食牛凡几。”（明·田汝成：《炎徼纪闻》卷四）

仲家，……以十二月为岁首，俗尚铜鼓，中空无底，时时击以为娱。土人或掘地得鼓，即请张言诸葛武侯所藏者，富家争购，即百牛不惜也。

（田汝成《炎徼纪闻》卷四蛮夷条）

世传诸葛铜鼓，然不始于诸葛。《马援传》：得骆越铜鼓，铸为马式，还，上之。注引《广州记》：俚僚铸铜为鼓，悬于庭，置酒招同类，来者以金银为大钹，执以叩，即留遗主人。诗曰：击鼓其镗，镗从金，则固起于三代，时所谓金声者，殆如此，必非锣也。

诸葛铜鼓皆奇文异状，雕螭刻，间缀虾蟆，其数皆四。杨升庵编内称：淳于，古礼器也，广汉什邡人段祖以献。益州刺史萧鉴，高一尺六寸六分，围三尺三寸，圆如桶，铜色如漆，令去地尺余，以手振之，声如雷，清响良久乃绝，古所以节乐，以诸葛鼓证之，疑即淳于。铜铁锅，锅口皆阿大王所制，更奇异。识者曰：非锅，乃鼎类也。其名曰。诗曰：溉之釜鬯是也。

《音乐旨归》云：大上小下，若甑铛，无足，和羹用之。或曰鼗也，亦无足，乃其实足以函牛，两耳峙如山形，蛮尤以为至宝，其重不啻铜鼓。

蛮中诸葛铜鼓，有剥蚀而声响者为上上，易牛千头，次者七八百头。藏二三面者，即得僭号为寨主矣。

凡破蛮必称获诸葛铜鼓，有多至数十面者。此必诸葛倡之，后人仿式而造，其精巧反有

过之者。

（朱国祯《涌幢小品》卷四铜鼓篇）

伏波铜鼓，深三尺许，面径三尺五寸，旁围渐缩如腰形，复微展而稍弇，其口锦纹精古，翡翠焕发。鼓面环作鼉十数，昂首欲跳。中受击处，平厚如镜。两粤、滇、黔皆有之。东粤则悬于南海神庙，西粤则悬于制府厅事。东粤二鼓，高广倍之，雌雄互应，夷俗赛神宴客，时时击之。重赏求购，多至千牛。制度同而小过半者，诸葛鼓也，价差别矣！

（邝露《赤雅》卷下）

铜鼓，昔马伏波征蛮物，以山溪易雨，因制之。一悬之梧州镇府左廊，昔沉潭中，声震十里，鼓出遂无怒波，人言其为崇，人舟赖以无险。

（张穆《异闻录》转引自汪森《粤西丛载》）

旧府中有伏波将军所铸铜鼓，其一尚存，其形不似今制，深三尺许，面径可三尺五寸，旁围渐缩如腰鼓，复微展而稍弇，其口似今人家竹培篝，体绝薄，纯绿色，纹甚精古，面环绕作鼉十数，昂首如欲跳状，中受击处亦平，但略厚如镜耳，已有断裂痕，击之声不甚发，闻一完好者，近为税监献之内庭，所悬木架，尚存堂之左右，有铜铸狼数柄，倒于地，制亦精，必非近时物矣。制府厅事左右，亦有铜鼓两架，径之小减半，而制作色质无异，出入遥见，款识之同异，不得就而辨焉。

（魏《西事珥》转引自汪森编《粤西丛载》卷十九）

夷俗最尚铜鼓，时时击之以以为乐。土人偶于土中掘得，辄称是伏波将军或诸葛丞相所藏者。土豪富室，必争重价求购，即至百牛不惜，与售膺骨董者亡异。

（魏《西事珥》转引自汪森编《粤西丛载》卷十九）

《岭表录异》唐时有牧童，闻田中蛤鸣往捕之，蛤跳入深穴，乃蛮酋冢，掘之得铜鼓，其旁多铸鼉之状，正与今总府所见者合，当是原有此体制，今铜鼓两粤滇黔皆有之，又或以为诸葛武侯者，不必尽伏波也。

铜鼓古传置酒招同类，来者以金钗叩之，此所谓金声，非锣也。今灵璧侯汤念嵩家有之。

（支允坚：《异林》，转引自郑师许《铜鼓考略》）

六、清

俚贼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最贵铜鼓，铸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来者有豪富子女，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因遗主人，名为纳鼓钗。风俗好杀，多构雠怨，互相攻击，辄鸣此鼓集众，到者如云。有是鼓者，极为豪强，号为都老，群情推服。本于旧事，尉佗于汉时称蛮夷大长老，故俚人犹呼所尊者为倒老也，言讹，又称都老云。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四广东八）

夷性颇朴淳，上刺一为号，作乐以手拍羊皮长鼓，而间以铜铙铜鼓拍板，其乡村饮宴则击大鼓，吹芦笙，舞牌为乐。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十云南四车里军民宣慰司）

九丝之蛮以万数，阿大阿二方三其著者也。当是时，阿大阻鸡冠岭，而阿二方三婴九丝城，壁垒相望……我师益冲击之，遂大溃，追获阿大于鸡冠寨，斩阿二方三于夜郎大盘之间，先后下寨栅六十有奇，斩首捕酋得四千六百余人，酋长十人，获铜鼓为诸葛鼓九十三面，他若牛羊诸物，不可胜计。时阿大见铜鼓，跪而泣，为大将军言曰：是鼓有神。凡鼓体剥蚀而声者上鼓也，可易牛千头，体泽而声者次鼓也，可易八百头。蛮人得上鼓二三面，可以王矣。当吾兴师时击鼓高山，诸蛮闻山头鼓声纂纂，未椎牛而饗之，而后出行劫，劫胜则复椎牛祭鼓以贿神，今可得乎？

（《西河合集·蛮司合志》五）

铜鼓湾在博白县北二十里，相传旧有汉时铜鼓，浮在水面有声，久之复沉。明弘治十二年，乡人获一铜鼓。

（《大清一统志》百七七鬱林直隶州）

铜鼓岭，在宾州南三里，人行岭上，逢逢有声。又南三十里为窑岭。

（《大清一统志》卷465思恩府）

湖南苗击铜鼓沙锣以祀鬼神，亲戚宴会以匏笙铜鼓为乐。

四川苗人喜鼓舞，宴乐则击铜锣鼓，吹横笛，歌舞。

两广苗俚人最贵铜鼓。铸初成，悬于庭中，置酒招同类。来者以金银为大钹，执以扣鼓，因遗主人，名为纳鼓钹。有是鼓者，极为豪强，号为都花。

云南苗夷，一名摆夷，筵宴酒初行，乐作，一人大呼一声，众人附和之，如此者三。既就坐，乐有三：曰夷乐、缅乐、车里乐。夷乐有箏笛胡琴响盏之类。缅乐者，缅人所作，以羊皮为三五尺长鼓，以手拍之，间以铜铙鼓拍板。乡村宴饮则击大鼓，吹芦笙，舞牌，为乐窝泥，又曰和泥，饮酒，以一人吹芦笙为首，男女连手，周旋跳舞为乐。花苗凡节序击铜鼓，吹喇叭，欢聚赛神，漫且男妇作欢，鸣叶吹笙，音节流畅，和以夷曲，其声暗然呼然，亦可听。

贵州苗红苗击鼓歌舞，名曰调鼓。八番宴会击长腰鼓为乐，仲家岁时击铜鼓为欢。土人或掘地得鼓，即以为诸葛所遗，富者不吝直争购。

（“湖南苗击铜鼓”以下五条，见《清朝通典》卷六十四，乐二）

天竺伎有铜鼓、羯鼓、都昙鼓、毛员鼓、篥、横笛、凤首笙篥、琵琶、五弦，具皆一，铜钹二，舞者二人。

（《清朝文献通考》卷146，乐考十九）

陈氏《乐书》曰：唐六典曰：凡军鼓之制有三：一曰铜鼓，二曰战鼓，三曰铙鼓。其制皆五采为重盖，究观乐图，铙鼓，鼓吹部用之。

（《清朝文献通考》卷147，乐考二十）

九真徼外蛮，其俗尚铜鼓，以高大为贵。方其初成，招致同类饮食，用金银钹击之。

哥罗国，汉时闻于中国，其音乐有琵琶、横笛、铜钹、铁鼓。

张蕃其王每岁正月一日，七月一日，公衙会诸蕃饮宴，亦动蕃乐。上户女出嫁，亦用铜鼓铜锣焉。

（《清朝文献通考》乐考二十一）

《律吕正义后编》曰：“铜鼓，以铜为之，径九寸七分二厘，为林钟倍度。深一寸六分二厘，为林钟三分之一。中间隆起，径二寸六分七厘三毫，为林钟二十分之十一。高八寸一厘，为林钟六分之一。边有二孔，以黄绒绦悬而击之。按《乐书》谓高州掘得铜鼓，其土隐起。《三才图会》谓虚其一面，悬而击之，乃与今之铜鼓近似。盖古之铜鼓，制亦不同今，惟当取其近似者为断耳。至于铜点，乃铜鼓之小者，后世用以为点，故以为名。今按其节奏，先击点，乃击鼓，鼓再击，乃击铜鼓，则是点与铜鼓为应和，亦犹将击鼓先击柝也。

（陈元龙：《格致镜原》卷47·乐器类铜鼓条）

史绳祖《学斋占笔》余尝见陆务观笔记，有云：予初见梁《欧阳顥传》称顥在岭南多致铜鼓，献奉珍异。又云铜鼓累代所无。及予在宣司，见西南夷铜鼓颇精，秘阁下古器库亦有二枚。此鼓乃南蛮用之，不足辱秘府之藏，然自梁时已珍贵之如此，不知何理也。”如上皆陆放翁之笔。第余尝观《东汉书马伏波传》云：援征交趾，得骆越铜鼓，改铸马式，上之，诏置宣德殿门。则铜鼓已见后汉传，非异书也。陆氏谓梁方珍贵，已失之矣。而欧阳生自梁，距汉世未甚远，而谓“累代所无”，尤可讶焉。

（陈元龙：《格致镜原》卷四十七乐器类铜鼓条）

发广州五十馀里，为南海庙，岁时有司致祭。……庙极宏敞，有铜鼓二：其一径五尺馀，刻镂精巧，青红斑驳，叩之渊渊，云是汉以前物。其一径三尺，声质俱劣，乃宋时物也。

（吴震方《岭南杂记》上卷）

按：马援既得铜鼓，铸为马式，若以鼓为援所制，何以自铸而自销之？其非援物可知。铜鼓出于诸葛武侯未生之前，以为孔明所制，亦属附会。宋人始有此说，故不录。

（张祥河《粤西笔述》铜鼓条）

雍正八年春，粤西北流县农民获铜鼓一，完好无剥蚀，翡翠丹砂，古色斑驳，非人间所宜私宝者，敬进阙下。是年秋，浔江铜鼓滩之下，波啮浪，有隐隐欲跃者，渔人纠众力举之，铿然又一铜鼓也，舁以来告，谛审量，高广轻重，文理色泽，虽皆不逮所献，而宏壮之模，缜密之文，绿沉之色，要非秦汉以下物也。权之得一千六百五十一两，絜之高一尺六寸而稍缩，面径二尺六寸有奇，周三其径，腰微束，仅六尺九寸余，底如其面而空。面有蟾蜍叠踞，大小各六，重之为数十二，意取律吕相生而应十二月盈虚之象欤。中边圆纹亦十二道，疏密相间，内皆细文，不一其状。旁有两耳如环，用以舁。通体完整，不缺不窳，似有呵护之者。按旧志载：伏波将军南征交趾，舟载骆越二铜鼓，跃入八桂江中，后有得之者，旋失去，殆神物通灵，抑隐见无常，将以待有德也。吾尝闻之传曰：鼓鼙之声，谨谨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铜鼓之制，非以作三军之气而慑百蛮之心者乎！恭逢圣德光昌，皇威远播，从古不毛之地，莫不奉正朔，输贡赋。铜鼓之出，一岁再见，固其宜也。爰慎度纪大略，位铜鼓于院署之右，列旗纛左，昭德宣威，柔远能尔，以镇边徼，垂奕当有式凭之者，岂独壮军门观已哉！

（金鉉《铜鼓记》载《铜鼓联吟集》）

广西巡抚中有大铜鼓一，雍正庚戌辽阳金德山中丞所得，位于堂隅旗纛之左，自为文记。之时，钱唐袁子，才左幕中，年未弱冠，会作赋，授简立就，坐客惊异。越七十余年，为嘉庆庚申，南康谢蕴山中丞始移置内署楼下，与秀水钱斐山学使同赋诗勒石于壁，自后无

过问者。道光丙申，余奉命承之是邦，初视事未暇旁及，楼又僻处东南角，为足迹所不到，亦竟不知有所谓铜鼓者。后繙志乘，展转得之。逾年丁酉春，遂移 怀清堂前，涤其尘封，加之拂拭，盖上距谢钱作诗时又三十余年矣。适权桂林守许君苟友新获一鼓来献，视前鼓尺寸稍减，而色泽之古，纹理之明过之，遂与前鼓分列庭之左右，宾僚咸纵观焉。惟金记前鼓谓周围有六蟾叠踞，重之为数十二，意取律吕相生。今细加谛视，实只六蟾，蟾各四足，不见有叠踞之迹。而新来之鼓亦六蟾，各三足，是肖物又较前鼓为精矣。按言铜鼓者，或谓始于马伏波，或谓始于诸葛武侯。然伏波得骆越铜鼓，铸为马式，语载《后汉书》最为可据。伏波不应自铸而自销之，是铜鼓实出伏波前无疑。若诸葛，更后于伏波，可不必辨。今粤西铜鼓径尺余者颇多，而四旁有蟾者绝少，或出后来仿造，若此前后两鼓形模之壮，则断非近物。周去非《岭外代答》所云：“虽非三代彝器，谓制自三代时可也”。蘊山先生作省志，极辨伏波诸葛之误，其诗更痛诋袁赋之非，不知赋家体裁，不主考据，非可深求，且此赋虽非极笔，而以伏波武侯对举，不下断词，正其用笔，狡狴处，遽斥为支辞，无根不已左乎。余既榻取谢钱旧诗，约同人各次韵以张其事。时幕中宾皆能诗，僚 自丁自庵学使以下，都人士自吕月沧山长以下皆有作，哀然成帙，因合录金记袁赋及谢钱诗于前，而以新诗次之，题曰：铜鼓联吟集。金记只一鼓，余更合两鼓记之，聊为此邦增一故实。若如金记所云“以待有德”，则非余之所敢当也。道光丁酉小暑节记。

（梁章巨《后铜鼓记》载《铜鼓联吟集》）

马流入常识其处，常击铜鼓祀伏波，盖所祖也，铜鼓与铜船，俱伏波所铸。

（檀萃《说蛮》）

铜鼓，粤人以为伏波，滇人以为诸葛，而实蛮之自铸也，会集击之，声闻数里以传信。

（檀萃《滇海虞衡志》）

广州波罗江上南海神庙铜鼓二：大者唐岭南节度使郑纲得诸高州守所献，面阔五尺，脐隆起，设两耳，通体微青，杂以丹砂瘢，其光可鉴。小者杀大者五之一，从浔洲滩水涌出，色纯绿，杂以鹁鸪斑。每岁二月上壬，土人击以乐神。民间有疾禳于庙，亦击之。考周官六鼓四金鼓，人辨其声用 章以土，挥人以木革以冒之，不闻 范金 也。迨伏波将军平交趾，诸葛丞相渡 泸，始铸铜为鼓，流传三川百粤颇多，岭南一道，廉州有塘，钦州有村，博白有潭，万州、灵山、文昌有岭，取以名其地。鼓初成，杀牲置酒，子女繁会，出金银钗叩之，纳诸主者。有讎怨相攻，则鸣鼓集众，俄顷乌合。蜀则凡鼓悉称诸葛所遗，其值易牛千头。苗民得此，雄视一方，要其制无若南海庙中之大。

（朱彝尊：《曝书亭集》《摘自《番禺县志》金石）

汉铜鼓

此器今世多谓之诸葛鼓，盖武侯渡泸后所铸。然考马伏波平交趾亦铸铜为鼓，则先诸葛有之矣。今岭南一道，廉州有铜鼓圩，钦州有铜鼓村，博白有铜鼓潭，则因以为地名矣。大抵两川所出为诸葛遗制，而流传于百粤群峒者，则皆伏波为之。今未能差别，统名为汉铜鼓云。又按唐岭南节度使郑纲出镇时，高州守林霭得之峒户，以献，纲纳诸庙，面阔五尺，脐隐起，罗布海鱼虾蟆等纹，旁设两耳，语与此合。而是鼓更作骑士，科洗乘而驰，旁挟一马，则旧说所未有也。

（《两清古鉴》卷三十七鼓）

夏铜鼓铭 时在东晋安帝义熙四年

张氏曾太云：董氏《广川书跋》载：陈升夏得铜鼓，甚大，铭曰：龙升元年七月，大匠涣按：龙升为夏纪年，惟鸿十六国纪赫连勃勃，以铜为大鼓，及飞廉、翁仲、铜驼、龙，常以黄金饰之，列于宫殿之前，疑即此也。此鼓形制绝倡，西南夷所作。鵬按七字作泰，六朝时人，每用之，知不始于唐武后也。

（《金索》二）

唐《六典》曰：武库令，军鼓之制有，一曰铜鼓，二曰战鼓，三曰铙鼓。（注：世本曰：巫咸作鼓，铜鼓盖南中所制。）

（张英等《渊鉴类函》“乐部八”，“鼓一”）

《玉海》曰：乾德四年，南蛮进铜鼓以请内附。景德元年，象州贡铜鼓，高一尺八寸，阔二尺五寸，旁有四耳衔环，镂人骑花蛤，推之有声。

张英等《渊鉴类函》乐部八鼓一）

杂录：南雄之俗，铸铜为鼓，欲将攻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家有此鼓者，号为“音老”。

（张英等《渊鉴类函》乐八鼓四号为音老条）

《明一统志》：好饮酒击铜鼓，豪富女子，以金银钗击鼓，叩竟，留与主人。或云：“铜鼓乃诸葛亮征蛮钲也”。

（张英等《渊鉴类函》边塞部五安南二、诸葛钲条）

铜鼓多马伏波及武侯所制，故称曰“诸葛鼓”，大苗峒方能有之。其大如钟长筒，三十六乳，重百余斤，中空无底。亦有土中掘得如坐墩者，周细花纹极工致。四角有小蟾蜍，两人舁行，以手拊之，声如鞀鼓。人传铜鼓，有此峒之鼓，盗于彼峒，夜见有虎，欲出啗人，迹之鼓也，还之乃静。

（陆次云：《峒溪彞志》中卷）

（景泰）五年，贼苗蒙能作乱，巡抚王永寿以贼苗能攻围龙里所、新化、铜鼓诸城，乞调兵剿之。而贼欲取龙里为巢穴，急攻破亮寨、铜鼓、罗开诸堡，都指挥汪迪为贼所杀。朝议以南河伯瑛为平蛮将军，统湖广诸军讨之，……克复铜鼓、藕洞，连破鬼板等一百六十余寨。

（犹法贤《黔史》卷三）

……乌蛮如此，群獠可知……赤降殃而白降祥，卜凭鸡骨（看鸡卦），持斧林间翻拾橡，驱牛坂上且高眠，醉鼓诸葛之铜，醺金寨社（诸葛铜鼓，蛮人宝之，冷吹娲皇之管，连袂踏歌……

（田雯《黔书》卷一苗俗条）

黔城南贮甲：铜鼓诸山，多武侯陈迹，世传侯于章武时南征，此其平蛮略地处也。……至于贮甲、铜鼓，陈迹依然。又何莫非侯之奇踪，响有以服南人之心也耶。

（田雯《黔书》卷三）

瓮仲家，一作普箎，又作补箎，在贵阳、定番、广顺二州，安顺、兴义二府，以十二月朔为大节。相传武侯南征时，所遗铜鼓，若掘地得之，击以为欢。富者常以重价争购。

（李宗昉《黔记》卷三）

《通志》：“铜鼓在南海庙中者二：大者征五尺，高称之，中空无底，钮垂四悬，腰束而脐隆起，旁有两耳。通体作络索连钱及水纹，色微青，艳若铺翠。小者杀大者五之一，高亦称之，制类大者。”考《后汉书》注《广州记》：“俚獠铸铜为鼓”。《宋史》：“蛮号有铜鼓者曰都老。”今之铜鼓，盖诸峒獠所遗。然今庙中所藏，内有镌云：“汉伏波将军所铸”，何以称焉？张穆《异闻录》云：“昔马伏波征蛮，以山溪易雨，制铜鼓。粤人亦谓雷廉至交趾，海滨卑湿，革鼓多痹缓不鸣无以振威，故伏波铸铜为之，状亦类鼓，名曰骆越之鼓。”此又一说也。廉州有铜鼓塘，钦州有铜鼓村，灵山有铜鼓岭，文昌万州亦有铜鼓岭，皆以掘得铜鼓而名。庙中铜鼓，一得之唐节度使郑绍所献，一得之浔州知府所献。

（李调元《南越笔记》卷六）

琼 州 铛

琼州有黎金，似铜鼓而匾小，上三耳，中微其脐，黎人击之以以为号，此即铛也。古时蛮部多以铜为兵，以铜为器，富者鸣铜鼓，贫者鸣铛，以为聚会之乐。

（李调元《南越笔记》卷六）

南海庙有二铜鼓，大小各一：大者径五尺，小者杀五之一，高各称广。大者因□时高州太守林霨得之于蛮酋大冢，以献节度使郑绍，绍以献于庙中者。其制中空无底，钮四悬，腰束而脐隐起。旁有两耳。通体作络索连钱及水纹。色微青如铺翠，半断起如辰砂，铜质尽化，金精独存，有光莹然可鉴，盖千余年物也。边际旧有六，今不存。其小者或谓出浔州铜鼓滩。先是滩水湍急，舂石底作铜鼓声，入夜辄有光怪，一日水涸，铜鼓见。太守取之，悬于四穿楼。其四角有金虾蟆五，为番人所窃，声遂稍石，乃归于南海庙中。色纯绿作鹧鸪斑，斜文纤丽，隐隐若八挂象。岁二月十三，祝融生日，粤人击之以乐神。其声豁若行雷隐隐，闻于扶胥江岸二十馀里，近则声小，远乃声大，神器也。嘉清间，海寇曾一本谋移去，铁索忽断，不可举。有老父云：“此铜鼓，昔浮海，至其鸣应潮，自为大盗所移，灵龟残缺，遂不复自鸣。”又云：“铜鼓之大者，旧雌雄各一，今庙所存者雄也。其雌向遇风雷，飞入狮子海中，今雄鸣则其雌辄相应云。”粤故多铜鼓。或谓雷廉至交趾，濒海饶湿，革鼓多痹缓不鸣，伏波始制铜为之，状亦类鼓，而稍埤缩，腹下杀，周以繁纹，面上八角皆缀以坐龟，名为骆越之鼓。或曰《晋书》云：诸獠铸铜鼓，以高大为贵。初成。悬于庭中，置酒召客。豪富子女则以金银为大钗，执以扣鼓，因遗主人，名纳鼓钗。攻杀时则声其鼓，至者如云。其所铸鼓，惟豪强称最，号为都老鼓。庙中铜鼓，盖诸峒獠所遗也。或曰《周礼》：“司徒有鼓人，掌六鼓四金之事。司马大阅，则群吏致其鼓铎镯钲，以听坐作。”故范铜为鼓，皆属军乐。意汉时其制尚存，故伏波铸之，留西南夷中甚众，其形皆如腰鼓，而面脐在上方。出庙中所藏，其内有镌云：“汉伏波将军所铸”，乃是阳识。凡三代铜器阴识，其字凹，秦汉用阳识，其字凸，阳识易成，阴识难铸，此必汉物无疑。大抵粤处处有铜鼓，多从掘地而得，其状各异，皆伏波所瘞以镇蛮者，每遇风雨，辄有声，诸蛮于溪遼峒之间，循其声之所自，往往求得铜鼓。盖物之神灵者，岁久，辄思自见。故永乐中万州土官黄惠，于多辉溪中得一铜鼓，长三尺，面阔五尺，凸二寸许，沿边皆科斗，各衔线缕抵脐，束腰，若今之杖鼓然者。击之，声如鹳鹤，闻数十里。万历间，茂名高田溪水暴涨，涌出铜鼓，径三尺，高二尺有奇，面列龟蛤六，遍体作细篆文，有朱砂积翠蜗蚀之孔十馀。其声铮铮，或以革掩底，或积水瓮中，盖而击之，声闻十馀里外。叩龟蛤则其声益远。而廉州有

铜鼓塘，钦州有铜鼓村，灵山有铜鼓岭，阴雨则岭上作铜鼓声。文昌万州亦有铜鼓岭，皆以掘得铜鼓而名。又博白县北有铜鼓潭，向有二铜鼓没其中。弘治已未得其一，以献两广制府。正德乙亥又得其一，以献县。罗定城隍庙有铜鼓，高二尺五寸，径二尺。州人争讼不平及被诬欲昭白者，击之则祸有归，无事而击，则祸击者。又雷州英灵冈雷庙有铜鼓二，其式如镛，围径五尺许，高亦如之。在左者面边螭六，右者螭五。其旁皆有两耳，每耳又分而二之。耳下有一兽首，反俯下足，入于郭。左者土花剥蚀，声短而无光泽，右者质理莹然如碧玉，其面稍廉三分，檐覆下六分，中心微拱而平。其晕有十三圈，晕各一声，晕中夹平绉如波纹。两圈作连钱纹，旁纹人字如莞簞，其绉作雷纹斜方斗纹，色翠绿彻骨。有一线丹午，后乘阴氧，苍润欲滴。午前象褐色稍淡，蚀处如蜗篆。又有一铜鼓在庶下，状亦如之，皆声闻十馀里。雷人辄击之以享雷神，亦号之为雷鼓云。雷，天鼓也，霹雳以劈雳万物者也，以鼓象其声，以金发其气，故以铜鼓为雷鼓也。吾观其碑，盖从天宁寺及英山掘而得者。昔伏波征交趾，欧阳守广州，皆以铜鼓进御。而伏波善别名马，得骆越铜鼓皆铸为马式，表上之。之数铜鼓或皆铸马式，之所馀未□知也。粤之俗凡遇嘉礼，必用铜鼓以节乐，击时先雄而后雌，官呼商应，二响循环，音绝可听。其小者曰钲，大仅五六寸。凡击铜鼓必先击钲，以钲始亦以钲终。钲者铜鼓之子，以子音引其母音也。然今铜鼓制皆小，最大者二尺馀，圆脐突起，隆面而浅唇，不作虾蟆花绣纹，大小颇如钲式，不及二庙所藏者远甚，惟雌雄之别则同。凡为铜鼓以红铜为上，黄铜次之。其声在脐。雌雄之脐亦无别，但先炼者为雄，后炼则为雌耳。然诸工不善取音，每铜鼓成，必置酒延铜鼓师。师至，微以药物淬脐及鼓四旁，稍挥冷锤攻之，用力松轻，不过十馀锤。而雄声宏而亮，雌声清以长，一呼一应，和谐有情，余音一风，若龙吟而啸凤也。广州炼铜鼓师不过十馀人，其法绝秘，传于子而不传女云。

（屈大均《广东新语》铜鼓条）

铜鼓，交趾服役，有飞头僚子，赤髯僚子，鼻饮僚子，皆穴居巢处。好饮酒，击铜鼓，鼓初成，置庭中，招同类，来者盈门，豪富女子，以金银钗击鼓，叩竟，留与主人。或云：铜鼓乃诸葛亮征蛮钲也。……

（徐延旭编《越南辑略》下册、古迹）

汉书曰：马援于交趾铸铜马。奏曰：臣闻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臣援师事杨子阿，受相马骨法。孝武帝时，善相马者东阿克，铸作铜马法，献之，诏立于鲁班门外，更名曰金马门。臣既备数家骨法，以所得骆越铜鼓铸以为马，高五尺五寸，围四尺五寸，谨献。诏置马德阳殿下。援在交趾得铜鼓数千枚，毁以铸马，是伏波毁铜鼓也，今反云伏波铸铜鼓，何哉？

（徐延旭编《越南辑略》下册古迹）

近年滇中铜鼓出土最多。余所见者数鼓，或曰得之昭通，或曰得之马边，或曰得之普洱。近又见滇督得之黔省播州者，大抵形质相似。考之《世本》：巫咸作铜鼓。巫咸者，岂即《尚书》之王家者耶？粤蜀交州之间，铜鼓尤著，不止滇与黔也。特巫咸所作不可见，粤蜀交州出土者亦不得见。今但就滇黔数鼓观之：高尺许，经围六七尺不等，重十斤以上，声极精壮，苔绿斑翠，花纹巧妙，鼓脐隆起如球，有四耳如螭。陆次云《峒溪纤志》：“铜鼓多伏波及武侯所制。”《游梁杂记》，诸葛鼓乃铜铸者，形如今楂斗之倒置，面有水四

水兽，四周有细花纹，置水上击之，声更巨。《边防记》：“马湖之夷，岁暮百十为群，击铜鼓。汉西南夷，叛服不常，诸葛武侯征之，置铜鼓，埋镇诸山。”《戎州志》：“铜鼓似覆盆。相传孔明铸，直数十镒，次者数镒。”《蛮司志》：“万历元年，川抚曾省吾平九丝城都蛮，获铜鼓九十三面，择有声者六十四以献。”《疏略》云：“都蛮称鼓有声者为上，易牛千头；次者七八百头。藏至二三面者，即得雄视一方，每出劫，击鼓高山，诸蛮顷刻云集。臣等细观，奇文相错，可辨者雕螭刻鹭，间缀虾蟆，其数四。父老云：诸葛制以镇蛮，鼓去则蛮运终，理或然也。”《益部谈资》：“诸葛鼓乃铜铸，重二十馀斤，广一尺七寸，高一尺八寸，乃孔明擒孟获时所制。昔伐九丝城，得馀面，今在成都府库中，一名镗于鼓。”冯大木廷、赵秋谷执信之诗，朱竹垞彝尊之跋，张介侯澍之《武侯集》，皆主诸葛铸鼓之说。顾以一地之鼓，多至百十，推之各地，当有千万，武侯造如许鼓，果足信否？或曰：“此伏波铜鼓也。”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朱补《溪蛮丛笑》，皆有此说。考（后汉书、马援传），援于交趾得骆越铜鼓，铸为马。《水经注》引《林邑记》亦同。伏波毁鼓，非铸鼓者。然正可见古铜鼓之多，不知伏波毁几许，始足铸马耳？秦汉之间，滇粤蜀黔旁及交州，风气大同。骆越之制，先见正史，各地风行，必不可以数计。虞喜《志林》：“建武二十四年，南郡男子献铜鼓，皆有铭。”章怀太子《后汉书》注引裴渊《广州记》：“土人铸鼓，悬庭招客，客来贺豪富，以金钗叩之，留赠主人”。《桂海虞衡志》又云：“铜鼓，古蛮人所用，南边土中时有掘得者。”《交州志》：“獠子好饮，击铜鼓。鼓初成，置庭中，招同类，来者盈门。女子以金银钗击之，即赠主人。”盖边风如此。且其用如刁斗，画烹饪，夜击鸣，用者广，斯铸者众。故西南诸省出土之铜鼓，往往不绝，不惟在诸葛先，且在伏波先，盖皆二千馀年物矣。（童仲华振藻据谢蕴山《铜鼓考》作校补最精）

（袁嘉谷：《滇绎》卷一“铜鼓条”）

晋义熙铜鼓

“大甲申□卯岁十二月五日造。”

（罗振玉《金泥石屑》）

铜鼓多无文字，吾乡姚氏咫进斋所藏“建武铜鼓”，后归端敏公宝华庵者，其文字乃后人增刻。惟扬州李氏藏晋铜鼓有“义熙年月”，楷书，阴刻，决为真物。予求其拓本，不可得也。此鼓为太仓钱氏所藏，虽时代稍晚，然亦罕观矣。

（罗振玉《金泥石屑》）

传世铜鼓多无文字，金石学录载周松儒先生春任岑溪时，得一鼓，底有铭，阳文，古篆，人不能识。陈兰庄考释得四十字五，均有龙集，庚午月建在卯语。此鼓今不知在何许，拓本亦未得见。惟仪征阮氏所藏晋铜鼓，予曾于亡友路君山夫斋中见其拓本，文曰：“义熙四年十月虞运官鼓，广二尺五分，前键宁远将率行铠曹杜□”，字迹劲健，在隶楷之间，阴文，环列鼓面。有晋一代，金文至罕。此器今归扬州李维之观察。戊戌春，李君允赠拓本。然至今尚未践此约也。

（罗振玉《匋庐日札》（光绪戊申手抄本）

晋义熙铜鼓考

清罗士琳

晋义熙铜鼓，上下广相埒，细腰无底，形如竹焙簪，而空其腹，青碧苍润，古色斑驳，面边虚出郭外，约半寸若飞檐。中心有脐，自脐至边有晕圈五道，每界作云雷纹，近脐则肖